

## 緒言\*

### 一．報告與附錄；馬歇爾使華文件的提供

隨著這本出版物的問世，馬歇爾使華的記錄可以說是完整了，從而極大地便利了我們對美中關係中這一有決定意義之事件的理解。如果將現在可利用的材料和幾年前的材料對比一下，立即就可看出，降低檔案保密等級和公布檔案材料的巨大價值是顯而易見的。例如鄒讜在其值得欽佩的著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1963年出版）中，不得不從零散的資料中綜合他對馬歇爾使華的記述，這些資料大部分是間接而不完整的。當時唯一可用的文件集是《中國白皮書》，該書論及馬歇爾使華的篇幅只有九十頁（四十四個文件），加上一百二十三頁的敘述。雖然鄒讜的處理在主要梗概上與事實大致是符合的，但缺少可資利用的新材料而使豐富性和充實性較為不足。此外，這些資料還提供了關於亞洲冷戰的早期發展，關於華盛頓政策的形成，關於這一時期中國政治、軍事和經濟形勢，以及關於中國國共兩黨對美國的態度等許多新鮮的知識。

---

\* 在這篇緒言的準備工作中，作者對艾蜜莉·霍尼格女士的研究性幫助表示感謝。

以前發表的材料唯一提到這個報告的地方，見於《美國外交關係，1946年》第十卷（第705頁），這個文件於1972年公布。這次所提到的事實表明，1946年10月1日，馬歇爾曾寫信給國務卿說，正在為他準備一份詳細的報告，並說，「在報告各部分完成後即分批寄送似乎是適宜的，『因為報告包括許多不能寫入電報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國務院可能會感興趣。』」到這年年底，已分期提交了六批這樣的報告，總共三十一章。最後三章以及關於中共對美國態度之補遺，是在馬歇爾回到華盛頓以後，大約是1947年2月完成的：這三章中最後涉及的事件發生在接近一月底的時候，而預定的三月份計畫尚未實施。

在形式上，報告是對出使任務的一種直率敘述，主要以編年體式為主，記述內容從1945年12月出使任務開始直到1947年1月使團被召回為止。報告不時地跳脫嚴格的編年體順序，以便針對某個特殊問題提出有關的說明，例如關於從中國遣返日本人員的部分（第十八章），以及關於美國海軍陸戰隊在中國的任務的說明（第三十一章）。

這個報告主要是以第一人稱，根據馬歇爾將軍自己的觀點所寫成。許多章，特別是當形勢影響到馬歇爾在國共兩黨之間的調處努力時，結尾都有對當時中國形勢的一般概括。報告雖然反映了馬歇爾自己的態度，但卻也是以非常客觀且公正的風格寫成。只是偶爾在報告的正文和一些附件中，馬歇爾的個性和感情才流露出來。報告的主調是耐心、機智和頑強的樂觀主義。

## 二．馬歇爾使華任務的前途

### 1. 背景

當赫爾利將軍於 1945 年 11 月 27 日在失敗中嘔氣辭去駐華大使職務時，中國的局勢是極端不安定的。儘管在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有零星的談判——包括蔣介石與毛澤東面對面的會談——真正的協定並未達成，中國似乎再度走向內戰的邊緣。

熟悉中國過去二十年各種事件的人對於這種前景並不感到意外。因為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時間，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在進行你死我活的流血衝突。有時——在 1927 年的恐怖時期和 1934 年長征前夕——共產黨幾乎被毀滅，但又殘存下來並再度成長起來。迫使這兩個宿敵暫且調停其爭端的，是日本侵略的殘酷事實，他們明白，若非如此，中國就要滅亡，誰也無法獲得什麼可控制的了。

但 1937 年建立的這種統一戰線，不久就顯示出破裂的跡象。經過大約兩年的蜜月之後，摩擦又重新開始了。衝突日益頻繁，並在 1941 年 1 月的激戰——即著名的「新四軍事件」——達到高峰。但因抗日戰爭仍在進行中，雙方都不願承擔發動與進行全面規模內戰的責任，此後雙方才都後退了一點。在四十年代初期，近四十萬國民黨精銳部隊封鎖著未被日軍包圍的共產黨地區。國共關係，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顯著的特點是上層保持著冷淡的禮貌，中層是不信任與敵意，地方一級則是無控制、無阻礙的鬥爭。

雖然日本的壓力暫時中止了內戰，但鬥爭有力地影響了兩黨力量的對比。國民黨從長江下游基地被趕到雖然安全但

十分落後的華西地區，他們集中在重慶，勢力被嚴重地削弱了。經過初期無私的抗戰決心之後，在國民黨中開始產生了厭戰情緒，人們開始聽到，且是日益經常地聽到關於腐敗、惡政、鎮壓、通貨膨脹和士氣低落等令人沮喪的話題。

共產黨對日本的挑戰卻導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它獲得了比戰前大得多的力量。日本人控制了共產黨主力所在地——華北的城市和交通線，但中共幾乎沒有丟失什麼，那些地方他們原就未曾佔有過。在此期間，中共依靠民族要求、堅實的社會改革和有紀律的熱情，深入發展到了侵略者根本無法駐兵的敵後農村地區。從1940年到1943年，日本人對這些根據地施加了可怕的壓力，但卻無法摧毀這些根據地。從那時起，日本不得不消耗大部分資源，徒勞地抵抗美國的無情進攻。戰爭的最後兩年，中共的力量又一次復甦了。

美國進入對日戰爭給中國局勢增加了新的一面。從援助和支持方面來說，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圖騰柱上居於低一級的等級，而歐洲則處於優先的高位，中國幾乎與各種外部供應的途徑相隔絕，美國跳島戰略的日益成功甚至使中國成為更加次要的戰區。雖然如此，使中國留在鬥爭中以盡可能地牽制日本的人力物力，對美國來說還是重要的。而且在展望戰後年代時，美國也設想能有一個強盛統一的中國，代替日本成為亞洲的主要強國。

美國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內疚感，認為對於幫助一個在珍珠港事變以前單獨英勇作戰長達四年以上並付出了巨大代價的國家來說，過去為他們做的實在太少，即使現在也是一樣。蔣介石和曾在美國衛斯理女子學院受過教育的蔣夫人，在打造個人獻身於國家之形象與提升國家聲望方面，是相當成功的——在美國公眾眼裏，他完全是中國及中國抗戰的化身。開羅會議（1943年）期間，在羅斯福的堅持下，克服了邱吉

爾的疑慮，蔣成為四巨頭之一的地位得到了國際上的承認。對我們來說，蔣已成為中國的同義語——像他早已這樣看待自己一樣。

蔣非常善於處理那種以虛弱的地位機靈地獲得成功的把戲。他以恐非情願地向日本投降作為微妙的威脅，目的在於以較好的條件獲得更多的物資和財政援助。他以自己能力不足為理由，辯解他無法以更大的力量進行抗戰，而同時又暗示、批評美國太小氣。其實蔣早就明白，日本最後將會被美國所擊敗，因而他認為沒有什麼理由將他的力量——這種力量戰後將會需要——消耗在沒有必要且不受賞識的作戰中。況且在一支重視效忠個人優於重視能力的軍隊裏，經常是缺乏戰鬥效力的。

這種態度激怒了中印緬戰區美國司令史迪威將軍（刻薄老總）。作為一個長期在中國任職、熟悉情況的尖刻步兵將領，史迪威決心完成上級指定給他的任務：進行抗日戰爭和改進中國軍隊的效率。由於遭到中國領導人的阻撓和破壞（這些領導人所關心的和他不一樣，而且對於「中國參與對日作戰相對來說並不重要」或許比他知道得更清楚），史迪威與蔣及其同僚一再發生嚴重衝突。1944年9月，達到了嚴重關頭，因而華盛頓面臨著抉擇：選擇支持史迪威，這就意味著我們美國與蔣的關係將會產生重大的改變；或者支持蔣，這就意味著要將史迪威免職。史迪威於10月被召回，接替他的是老練得多的魏德邁將軍。同時，赫爾利將軍以羅斯福私人代表（後來是大使）的身分被派往中國。

赫爾利或許是一個和羅斯福一樣自己人格力量充滿自信的人，他負責將中國留在抗日戰爭中，試著把國民黨和共產黨撮合在一起，並尋求一個在蔣介石領導下使中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統一起來的基础。赫爾利對中國幾乎是一無所知，

但他相信，一旦共產黨確知蘇聯不支援他們，而且如果兩黨都簽字承認他堅持寫進大部分建議草案中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原則，那麼共產黨是會屈服的。以他不完整的認識中，共產黨類似美國的一個反對黨（他曾說，就像「奧克拉荷馬州的共和黨」），雖然他也知道，共產黨是有槍的。只是到了後來，他才改變看法，以非難的措詞表示，要把中共領袖們當作獻身的史達林主義者和頑固的革命家來看待。

令人驚訝的，不是赫爾利使命的失敗，當時看似有希望的談判畢竟是開始了。要批評赫爾利的無知與自負很容易，但他的失敗不光是他個人的失敗。這種失敗根深蒂固地存在於小國的現實和美國政策的矛盾性質之中。當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的爆炸促使俄國倉促佔領滿州，然後又導致日本突然過早投降的時候，中國的情況就是這樣。

日本的投降使所有政黨都感到有點措手不及。1945年8月和9月，國民黨收復了華中和長江下游的許多地區，並堅持他們在所有地方接受日本投降的權利。在此期間，中共在華北大為擴張。在9月下旬和10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北方幾個港口登陸，以協助處理日本投降事宜，並開始了運送國民黨軍隊的過程。國民黨部隊和共產黨部隊之間，不僅在華北，甚至在華中都早已發生衝突。蔣和毛的會談，就是在這種混亂時期中，由赫爾利將軍催生下舉行的。但這讓赫爾利感到做了有損體面的事情，便於9月返回華盛頓。他在華盛頓生著悶氣，直到11月27日才發表了一個充滿怨憤的辭職聲明，把他的失敗都推到不忠誠的下級身上——這種不公正的譴責後來常常糾纏著這些人。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這對往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幾個月裏，中國的許多重大事件多半是放任其自由發展的。蘇聯完全佔領了滿州，而只有在日本侵略時曾經一

度停止的內戰，現在又有再次爆發的危險。在這種危急關頭，杜魯門總統要求馬歇爾將軍作為他的特使，以大使身分前往中國。

杜魯門總統派遣一位如此卓越的人物去中國，正是象徵著把美國的威信極大地託付給使團，並表明美國派遣使團目的之重要性。馬歇爾將軍不是一個中國通，但他對這個國家遠比他的前任知道得多。他曾在中國任職三年（1923—1926年），在駐天津的步兵第十五團服務。在此期間，他認識了派到該部隊任職的史迪威。他們成了朋友，這種友誼一直持續到1946年史迪威逝世。刻薄老總史迪威在中印緬戰區的困難日子裏，馬歇爾是他的上級，有時又是他的密友。最後，馬歇爾具備了從戰時無與倫比的經驗中獲得的關於世界政治的知識。

## 2. 馬歇爾、馬歇爾使團和美國的政策

馬歇爾將軍的地位是困難且矛盾的。嚴重地損傷了赫爾利使命的就是這種同樣的矛盾，儘管這兩個人在氣質上和能力上有天淵之別。矛盾在於這種事實：矚望於馬歇爾的是作為一個中立者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進行調處，但同時美國卻只承認一方（國民黨政權）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種矛盾的後果既有著象徵性又具有實質性。

這種情況鼓勵了國民黨的信念（以前的各種事件均未能削弱此種信念），認為美國不會，或者不能拋棄他們，無論他們如何發牢騷、批評或礙事。基於同樣的原因，共產黨對於美國是否真正中立的懷疑也由此增加了。更為實際的是，戰時和戰爭剛結束所簽訂了許多對中國提供援助和支援的協定，都是專屬國民黨的。這些協定包括諸如訓練和裝備中國

軍隊、租借軍需品、出售剩餘物資、海運及空運中國軍隊到滿州和華北等。馬歇爾決心不使美國干涉中國內爭，但他也堅持要履行這些協定，即使這些協定可能對這兩個抗爭者產生某些難於縮小的「附帶影響」。

然而馬歇爾將軍不光是這種矛盾的受害者，他也是這種矛盾的部分製造者。這個報告在論述使團的起因上講得十分簡略，只提供了對華政策的公開聲明和杜魯門的正式指示信。《美國外交關係》一書裏集中了有用的文件，對此提供了一個比較充分的畫面。馬歇爾在 1945 年 11 月 30 日給美國武裝部隊參謀長李海海軍上將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我想共產黨將盡可能地阻撓談判的一切進展，因為拖延對他們有利……而且拖延得越久，蔣委員長能夠在滿州建立一個外表像樣的控制權之可能性就越小，結果肯定將是由蘇聯建立起這種控制。」（《美國外交關係》，1945 年第七卷，第 748 頁）在其他方面，馬歇爾和他的同事們也指出，創建一個強大而和平的中國，從人道主義的立場看，它本身是可取的，同時對他們來說，又具有戰略上的重要性，可以以此作為節制或遏止蘇聯在遠東影響的最好手段。

與此種考慮有關係的，是美國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之政策問題。1945 年 12 月 11 日，馬歇爾在離美前不久，曾與貝爾納斯國務卿和杜魯門總統會晤。經商定運輸國民黨軍隊到滿州應成為公開政策之後，又商定做好將國民黨軍隊海運及空運到華北的準備，但此種準備應當保密，以便使馬歇爾能利用此種不肯定作為手段對付國民黨和共產黨。如果判明共產黨是不妥協且會礙事的，運輸工作就進行下去。

最後，馬歇爾將軍說，據他（馬歇爾將軍）的意見，假如蔣委員長未做出合理的讓步，使取得政治統一的努力都歸於破滅，而美國又放棄對蔣委員長的繼續支持，那麼接著將



發生這樣的悲劇性後果：一個分裂的中國；蘇聯可能再度在滿州取得權力；其結果就會使我們太平洋戰爭的主要目的歸於失敗或遭到損失。馬歇爾將軍問，在此情況下，是否還要他在那種不幸的不測事件中繼續幹下去，並協助蔣委員長將軍隊調運進華北。這樣做將意味著美國政府不得不取消它的自尊心和它的許多政策。總統和貝爾納斯先生同意對問題的這種看法……

（《美國外交關係》，1945年第七卷，第768頁）

三天以後，馬歇爾將軍以較為明白的措辭闡明了這個決定的含義：

我曾說過，我對訓令的片面理解未寫成書面文字，但我希望對他（杜魯門）能有一個清楚的交代，也就是說，萬一我無法從蔣委員長那裏獲得我認為是合理且可取的行動時，對美國政府來說，仍有必要通過我繼續支持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國政府政策的條款範圍內通過蔣委員長進行支持。

（《美國外交關係》，1945年第七卷，第770頁）

杜魯門總統和艾奇遜副國務卿都明白地確認了此種理解。因此，馬歇爾使命的一環與冷戰考量是分不開的，這種冷戰考量早已在支配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

只有乍看之下才會感到奇怪，為什麼這些考量在這份報告中一點也沒有涉及（報告中下達了準備運輸軍隊的保密命令，但並未清楚說明這樣做的理由）。報告有部分是在馬歇爾在中國的使命結束之前由使館人員準備的，以作為給國務院的電報的進一步闡述。將這些格外敏感的考量包括在報告中，顯然是無法憑空想像的。

雖然馬歇爾有一個限制蘇聯在遠東影響的戰略需要之設想，但這些相仿考量所反映的，卻是對蔣介石是否願意和平解決中國內部困難方面進行合作的懷疑。馬歇爾在華的一年中，此種懷疑增長著，直到成為一種無法避免的確信——儘管他通常試圖譴責蔣周圍的「反動派」，而不是蔣委員長本人。

在報告中，雖然有時能夠在字裏行間感覺到這個較具規模的戰略設想，不過人們通常難以看出這一點。相反，報告使我們陷進了日復一日的談判，建議和反對建議、雙方的新要求以及譴責毫無誠意等等的戰術活動舞臺。在這個舞臺上，馬歇爾的不偏不倚和光明正大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保持著一個關於簡況介紹、會見與會議的前後交錯之時間表——所有這些事項幾乎都包含著極為複雜的問題，其中大部分都需要緊張地運用警惕和圓通的公正才能下判斷。他前任使員的使命可說是純粹在追求個人之成就，而馬歇爾卻避免拋頭露面，雖然他在中國的力量與中心地位是無庸置疑的。在這種高度上，沒有跡象透露他進行操縱手段或有任何口是心非，在國共雙方意見相反的非難面前，馬歇爾很好地衛護了他的公正無私。

的確，這個報告總的來說，對國民黨的批評要比對共產黨的多，在使華的頭幾個月、和平希望最光明的時候尤其如此。這些希望包括在三組協定中，其中第一組可間接歸因於馬歇爾的努力，另外兩組則是直接可歸功於他的。第一組協定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審議，政協包括所有黨派和團體的代表，會議從1946年1月10日進行到31日。政協的召開早已在討論，但實際召開顯然是任命馬歇爾使華的結果；政協通過了為實現擴大政府基礎和接著改組政府的若干程序和步驟。第二組協定是三人小組的工作，該小組於1946年1月7日召開首次會議，結果導致達成了1月13日的停戰令，

並導致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作為履行停止衝突的機構。第三組協定是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共產黨部隊為國軍的基本方案之協定，這是經過長時間曲折的會談之後於2月25日締結的。

當然，所有參與者和觀察家都承認，這些並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只不過是將來支付的期票，其價值將有賴於貫徹這些協定的誠意。儘管如此，在那段使大家充滿憂慮的時刻，這些協定還是成為當時的重要成就而受到歡呼，這是可以理解的。就在這多方面慎重考慮期間，特別在努力採取下一步超出它們範圍的步驟時，在馬歇爾看來，國民黨的缺乏誠意都表現得更明顯，甚至（他有時說）是「愚蠢的」犯罪，而共產黨卻似乎表現了較大的靈活性和通情達理；馬歇爾批評共產黨有時是直率的，如在他們4月份佔領長春時，以及對他們反美宣傳的批評，但他最尖銳的評論經常還是對著國民黨的。使他特別惱怒的，是他們頑固地堅持把滿州排除於停戰條款和軍調部休戰小組的監督之外，且他們的努力還幾乎成功了。他知道，滿州是能使全中國燃起烈火的火把，而且他明白，國民黨自信有能力以武力解決那裏的問題是一種危險的妄想。

只是到1946年6月以後，當華北、特別是滿州形勢的不斷惡化，使人們對於三項協定最堅定的希望（馬歇爾的希望就是最堅定的）幾乎黯淡下來的時候，馬歇爾批評的鐘擺才擺回來，擺向共產黨。接著就是滿州休戰（6月7日至30日），這最後的一著遭到破壞，這個休戰是為了試圖讓談判再度進行下去而獲得的一個短暫喘息時間。然而談判並未舉行；國民黨偏離馬歇爾目標的自信心依然持續往錯誤的方向增長，此時的共產黨，由於感到被逼入絕境，變得日益頑固、倔強且捉摸不定。當時的狀況就是，馬歇爾無法指望雙方接受要求，國共兩黨都不願按著他設定的目標前進。即使到這

時，馬歇爾也並未減少批評國民黨，但他更多的是譴責共產黨。

在閱讀自7月初的事件直到使團被召回（1947年1月6日正式宣布，但前年12月即已決定）的這段報告時，人們可以感受到，馬歇爾是盡了全力想把他的使命堅持到底，即便他夠英勇，可惜卻徒勞無益。到9月下旬，馬歇爾鄭重考慮要結束他的使命，10月，他已實際起草了國家要求召回他的命令，並送交華盛頓，以便等他通知要回去時發出。只是蔣委員長最後一分鐘的呼籲，才說服了馬歇爾勉強留任。在此期間，周恩來離開南京前往上海，蔣介石也經常離開南京。

在1月和2月份曾經目睹過實質性談判的各個要點，到夏季和秋季只看到了尋求某種據以開始會談的基礎（無論什麼基礎）之企圖已然流產：五人會議、三人小組、第三方面的調停，這一切都失敗了。因此，在1947年1月，馬歇爾離開中國，宣稱雙方都有毛病，譴責國民黨中的「反動派」和共產黨中的「不妥協分子」，使他的使命歸於失敗，並稱目前問題的解決須決定於內戰。

有趣的是這個報告對馬歇爾臨別評語的一個部分作了新的說明，馬歇爾寫道：「據我看來，挽救時局要由政府中和少數黨派中的自由主義者掌握領導權，這是一些傑出的人物，但現在還缺少足以發揮決定性影響的政治權力。我相信，在蔣介石委員長的領導下由他們發揮有成效的作用，將會通過良好的政府導致全國統一。」這一段話常常被人解釋為馬歇爾思想過於天真的反映，竟以為這樣一個七拼八湊的無權集團甚至還有重新掌握領導權的極小機會。但顯然馬歇爾只不過是盡他的可能試圖增強他們的實力，這是向國民黨做出的一種表示，並未設想這就必然管用。

或許就像我們在這裏試圖描述的一樣，正是報告的這個主旨，使馬歇爾回國後寫了〈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態度〉這一補遺。按推理來說，報告本身對共產黨的批評似乎還不夠，而且為了矯正平衡，現在有必要重提和詳述馬歇爾所看到的他們那些「違法」的事。他特別集中批評共產黨發出的反美宣傳，包括對他本人的反覆攻擊——即使在中共領袖們（如周恩來）私下對他的努力所表示的態度是同情和支持時，也是如此。補遺也詳細地描述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和共產黨軍隊捲入的一些事件，尤其是7月29日在安平의衝突；在這次衝突中，美國海軍陸戰隊三人死亡，十二人受傷。這個補遺在這份馬歇爾報告中以冷戰的語言作結束：「但最後，他們（中共）行為的中國特點，似乎已因使用世界各地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手段而被淹沒，他們的反應和態度，也和這些運動是一種類型的，特別是涉及美國的時候是如此。」

### 3. 國民黨和共產黨

回顧起來，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內戰看來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兩黨肯定都不相信——或者說，都不瞭解——任何基於選民定期向議員提出要求的多黨制議會民主；兩黨都不想讓對方支配自己，也不接受任何對他們奪取霸權的最後機會之不利條件；雙方也不以類似的條件看待自己。對國民黨來說，共產黨是反對合法、法定且得到國際承認之全國性政府的反叛者；他們有一定的權利，但無據此提出合法要求的權利。另一方面，共產黨認為他們是完全獨立自主的政權，統轄著大片土地和眾多的人口，戰爭成績斐然以及他們所統治地區人民的支持，已使他們的政權合法化了。雙方都把最後的信心寄託在他們的軍事力量上。

通過報告描述的所有紛亂事件和馬歇爾使團文件的提

供，基本的僵局是十分清楚的。國民黨堅持要在改組政府的政治軍事機構（這是他們希望控制的）之前統編共產黨軍隊和地區。共產黨拒絕減低他們對軍隊的控制及對其根據地的政治領導權，直至令他們滿意的改組進行之後（即使到那時可能還拒絕這樣做）。馬歇爾則尋求同時或緊密連續地解決這些問題的某種方案，同時試圖通過停火安排和軍調部，將正在進行的敵對行動和雙方運用欺詐手段圖謀利益的行為加以阻止或減少到最低限度。

可是雙方都既有實力又有弱點，而且每一方都感到了一定的壓力。將戰場轉移到政治舞臺的某種聯合，可以不過分損傷實力又補償弱點，這至少是可以想像的。就是基於這種動搖且含糊的理由，在小國，和平的希望才在熄滅前短暫地閃爍過。

有兩種主要且互相關聯的壓力。第一種壓力包括那種難於確定的、通稱為中國輿論的分量。不管這種輿論在中國與美國的作用是如何不同，中國人民想望和平與安定是無庸置疑的。這對城市裏有教養的中國人、與對鄉村的農民來說，都是真實的。雙方都經不起失去合法性，也經不起失去伴隨著公開聲明內戰政策而來的人民支持之喪失。

第二種壓力與以馬歇爾將軍在華為象徵的美國態度有關。對國民黨來說，其目的在於逼迫共產黨，並從中獲取各種利益，小心翼翼地不採取可能會過於顯眼而引起美國撤銷其承認和支持的行動。杜魯門總統雖有上述的私下理解，但他在要求中國實現和平時曾在他的公開聲明中暗示過這種撤銷的可能性，並說，「一個不統一且被內爭所分裂的中國，事實上不能認為是美國援助的適當地區。」

蔣介石或許已經感覺到（特別是 1944 年史迪威事件以

後），美國對華政策選擇的餘地不多，也沒有吸引力。儘管如此，撫慰美國並從美國得到盡可能多的道義上、物質上的援助還是重要的。這包括對馬歇爾將軍的不斷考驗，有時逼迫得他幾乎到達極限，然後又暫時顯得格外趨於和解。而這些通常是籠統的、有條件的局部讓步又被用來作為基礎，以便沿著國民黨要遵循的路線進行下一次推動。

馬歇爾當然完全明白這種策略，這使他感到厭惡，並想法在美國全面政策所提供的有限手段範圍內儘量抑止這種策略。他在這個範圍內的努力，除對國民黨領袖們的直率談話，以及他認為共產黨立場正確時支援他們外，主要是 1946 年 7 月 29 日下令「禁運武器」。但由於其他幾種援助在此同一時期內繼續進行，此種行動的效果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心目中都大受損害。使共產黨憤怒的一個事例，是 1946 年 8 月 30 日中美出售剩餘物資協定的締結。雖然馬歇爾斷然堅持這並非軍事裝備（即不包括武器和彈藥），但他又狼狽地向周恩來承認，他知道國民黨正在將很多這種裝備在公開市場上大量拋售，而將所得的錢用於軍事目的。

在報告中，馬歇爾以敏銳的悲觀主義作出論斷，他寫道：

……儘管有杜魯門總統 1945 年 12 月的對華政策聲明，儘管有美國繼續調處的努力，美國最終還必須支持國民政府反對中國共產黨。因此，我相信，國民黨認為，如果在此期間他們能將共產黨在軍事上降到比較虛弱的地位（根據他們的情報報告，蘇聯這時不會以援助共產黨的辦法進行公開干涉），那麼目前他們就有條件暫時放棄他們所渴望的美國軍事的、財政的和經濟的援助。他們顯然在想，在他們反對共產黨以加強對國家的統治方面取得勝利之後，並在通過憲法和使除共產黨之外的一切少數黨派都參加政府而實行憲政之

後，這種援助就會到來。

對共產黨也一樣，美國造成了問題，也造成了機會。他們似乎想像了一系列的可能性。像國民黨一樣，這些可能性引導他們給馬歇爾一個良好的印象，而面對國民黨政權又不損傷他們的體面。最大的可能性（在赫爾利使命垮臺之後，他們或許只能對此寄以適度的希望）是美國可能承認共產黨為中國的一個合法的政治競爭者，從而打破國民黨作為美國援助的唯一要求者的這種壟斷。這大概就是幕後的想法，使他們很快接受了美國的訓練與供應分遣隊同國共雙方部隊一道工作，以準備最後統編為一支國軍的建議（此建議從未實行）。他們的這種希望或許也被馬歇爾在早期談判中的公正行為所鼓舞。

即使這個目的達不到，這樣做也還是重要的：試圖將馬歇爾和美國同國民黨的事業盡可能分開；如果不能贏得支持，就誘使美國中立；阻礙美國全面支持國民黨並代表國民黨進行干涉。在報告中，馬歇爾經常以明顯的惱怒提到來自共產黨的反美聲明，包括人身攻擊。這些聲明常常是激烈且歪曲的，但又強調，利益的衝突是馬歇爾作為誠實的捐客又作為繼續支持對方的一個政府代表這種雙重角色的固有性質。這種宣傳，正如已指出的那樣，通常與周恩來及其他人私下對馬歇爾表示的態度——即相信他的正直和讚賞他的努力，形成鮮明的對照。共產黨也像馬歇爾本人一樣，在戰略和戰術兩方面行事，在戰術上他們承認馬歇爾的公正，但在戰略上譴責美國的政策。

如果這些（中國的輿論與美國的作用）就是對國共雙方產生影響壓力的話，那每一方都有一張實力和弱點的平衡表，談判（或者談判換來的時間）可以幫助改正這張平衡表。

從表面看，平衡表似乎明顯地對國民黨有利，這無疑促



使他們不願做出真正的讓步和有約束力的許諾。國民黨享有國際承認的壟斷權；他們的軍隊部分是美國訓練和裝備的，其數量大約三倍於他們的對手，並在較大型且較尖端的裝備方面具有幾乎是全面的優勢，包括軍用飛機在內；他們的經濟形勢有某些光明的地方，包括在美國有近十億未動用的貸款。另一方面，軍事力量的大小卻掩蓋不了它的悲慘狀況，不適宜的領導和低落的士氣，這種士氣低落已成為大部分軍隊的特點。如脫韁之馬的通貨膨脹已經開始，貪污腐敗漸漸吞沒了國民黨的供給。國家的重建在多年戰爭之後是一項巨大的任務。

最後，國民黨的力量還不足以遵循要將華北和滿州立即重新統一的政策，在那些地方他們的努力一直是薄弱的，近年來更是完全不存在。但這些弱點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能立即明瞭，其含義也不為人們所充分理解——最不理解的要算是蔣介石了。

但馬歇爾看到了這些，並在八月份就預言這可能意味著什麼：「我與蔣委員長和最接近他的顧問們意見不同，因為我認為他們目前（尋求軍事解決）的做法，可能會導致共產黨控制全中國，目前正在發展中的混亂狀態不僅將削弱國民黨，而且將為共產黨提供一個破壞政府的絕好良機。」

共產黨的平衡表是與國民黨平衡表全然相反的鏡象。他們沒有國際承認，未接受國外援助，雖然也有重要的例外，即蘇聯允許他們在滿州接收日本武器（但這也需特別指出，國民黨在華中和華北接收的這種日本交出的武器裝備，要比共產黨在滿州接收的多得多）。除在它自己的管區外，中國共產黨是被作為一個非法政黨來對待的。他們的軍隊比較少，而且武器裝備也缺乏得多，但他們的領導、士氣和戰術都是極好的。他們佔據的是中國比較貧窮的地區，但他們的

經濟卻建立在健全儉樸的基礎上。像國民黨的弱點一樣，共產黨實力的重要性與強度也經常是被低估的。然而其弱點與共產黨領袖們較大的政治敏銳相結合，就導致馬歇爾報告中指出的那種起初更為實用主義的路線。

的確，早在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他的重要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就對實力和弱點都作了估計，並指出了共產黨準備據以參加這樣一個聯合政府的各種條件。過了幾個月，在戰勝日本之後不久，在一項黨內指示中，毛對此甚至更加明確。在指出蘇、美、英都反對中國內戰之後，毛注意到，國民黨由於返回他們先前政權的基地——滬寧地區而加強了自己的地位。他於是接著說：

但是（國民黨）仍然百孔千瘡，內部矛盾甚多，困難甚大。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後，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我方亦準備給以必要的、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讓步。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讓步是有限度的，以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為原則。在我黨採取上述步驟後，如果國民黨還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國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採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

（《毛澤東選集》，第1051—1052頁）

大約就在1946年6月底，滿州暫時休戰期滿的時候，共產黨顯然斷定，讓步的時間已經過去。他們依然試圖在國內外「取得」輿論的「同情」，但已經勾銷了談判解決問題的可能性，7月間就發出了動員令。

正如馬歇爾所指出的，國民黨軍隊到處進攻，奪取城市，但並未與中共軍隊交戰和擊敗中共軍隊。每一次勝利——實際是每一次過分地延長其戰線——都使國民黨變得更加確信他們以武力打敗共產黨的能力，也更難順從妥協。和平的基礎像華北的黃土一樣，就這樣侵蝕、破碎、坍塌了。

#### 4. 結語

在馬歇爾 1947 年 1 月從中國回來出任國務卿時，他已確信，美國無法再影響中國問題的結局。他準備繼續承認蔣和國民政府——對此，選擇的餘地是不多的——但他決心除絕對必要外，不使美國在這個不幸的國家捲入更深。但一些事件的勢頭（這時是國內的政治壓力）還是迫使他阻礙其決心的實現。在蔣在國會內的許多支持者和全國的強大壓力下，武器禁運終於在 1947 年 5 月解除了。經濟援助則根據各項協定和法案繼續進行。

到 1948 年初，冷戰遠比馬歇爾兩年前剛到中國時嚴峻且激烈。而且代表國民黨對議員進行的疏通活動也在相應地加緊進行，這不僅是因為冷戰，而且也因為在過去六個或八個月中國國民黨遭受了嚴重的挫折。現在主動權在共產黨手裏，平衡表迅速地改變著。馬歇爾被這種雙重壓力所推動，在 1948 年 3 月發表聲明說：「現在共產黨已公開反叛政府，此事（是否應將共產黨包括在中國政府之內）由中國政府決定，而不由美國政府授意。」

（《中國白皮書》，第 272 頁）

8 月，馬歇爾甚至以更為強烈的措辭概述了美國政策：

1. 美國政府不得直接或間接作出暗示，以支持、鼓勵

或接受在中國建立有共產黨參加的聯合政府。

2. 美國政府無意再作為調處者在中國進行斡旋。

（《中國白皮書》，第 29 頁）

在蔣和國民黨失敗而逃往臺灣之前，美國政府對他們實質性援助的最後一次分配，是 1948 年 4 月最後通過的具爭議的援華法案。這個法案終於導致二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的經濟援助撥款和一億二千五百萬「由中國政府自行處理」（即購買軍用物資）的美元撥款。馬歇爾對這個法案有強烈的疑慮，但由於兩個原因，他還是支持了該法案。第一，這是對馬歇爾歐洲計畫廣泛的兩黨支援的部分代價：該法案是包括歐洲復興計畫在內的混合援外法案的一部分。第二，這是一種有限的手段，打算用來堵塞那些要求全面干涉以挽救蔣委員長及其政權的人的嘴。馬歇爾在參眾兩院外交委員會的行政會議上的部分證詞是值得略加詳細引證的：

近來有一種傾向，認為共產黨勢力在哪裏施加影響，我們便應該立即在哪裏迎擊。我認為這是最不聰明的辦法，因為這無異是拱手把主動權讓給共產黨，共產黨因此而可以使我們的勢力分散，處處都不能發揮特殊的效力。我們必須準備應付這種可能性，即日前的中國政府或許不能成功地在對抗中共軍隊、或在中國可能興起的其他反對力量中保全其自身的地位。不過根據上述事實，只能得出結論：目前的中國政府不能將中國共產黨削弱到完全無關重要的地位。為在最近的將來達到這一目的，就需要美國以廣大且很可能繼續增加的規模，負責保障中國政府的軍事努力和中國的經濟。美國勢必要準備在事實上接管中國政府，並管理中國的經濟、軍事和行政事務……這樣龐大工作的行動方針，最後所要付出的代價是無法估計的。這肯定將是一個長期的行動。它將牽連美國政府使它不斷地承擔義務，以致事實上無法從中撤

退，很可能由於使中國成為國際衝突的舞臺，而使美國承受嚴重的後果。企圖負責保障中國的經濟和中國政府的軍事努力，將使美國在經濟上負一重擔，在軍事上加一種義務，這是我不能建議政府採取的行動方針。

（《中國白皮書》，第 382 頁）

在所有這些事件的混亂和激怒中，美國駐莫斯科大使肯南的一份報告沒有引起注意，這份報告是在援華法案通過兩年多以前，正好在馬歇爾到達中國幾天之後送交給國務卿的。雖然謹慎地斟酌他的結論，肯南還是寫道：

我們將不會因為得知延安（即中共）對莫斯科有一種驚人的獨立而感到驚奇。我們的理由如下：

1. 中共感謝蘇聯的理由不多。他們殘存下來和成長起來，並不是因為有與莫斯科的關係，而是因為輕視這種關係。墨守早期共產國際的指示，使中共得到了近乎災難性的後果。在中日衝突中，蘇聯只供應武器給重慶，重慶又以若干這種武器封鎖延安。現在蘇聯在滿州的掠奪，變成他們在摘取中共覬覦已久的果實。
2. 中國共產黨是所有共產黨中最成熟的黨，並已發展了自己招牌的馬克思主義與固有的傳統。
3. 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夥亡命的陰謀家。他們已有一個既定事實上的政權達十年之久，有他們自己的軍隊和民政。因此他們有已發展的實質性既得利益。
4. 中國共產黨具有民族色彩。從 1936 年到日本投降，他們所面臨的、以及宣傳上集中攻擊的是一個外部敵人。他們的軍隊和追隨他們的民眾迅速擴展，大部分是建立在民族主義基礎上的。

（《美國外交關係》，1946年第九卷，第119頁，  
1946年1月10日。）

沒有證據說明馬歇爾曾看到這份報告，如果他曾看到的話，也沒有跡象說明他對此如何反應。其間，在中蘇分裂充分證實肯南的嘗試性分析之前，要有十四年的時間，中蘇分裂後到美國領袖與中共領袖之間的真正對話再度恢復之前，又過了十年多的時間。

萊曼·P·范斯萊克

1976年7月4日

